

印度文化史

A.L.巴沙姆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K25.25
3

99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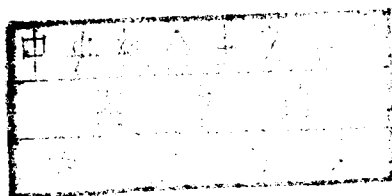
印度文化史

A. L. 巴沙姆 主编

闵光沛 陶笑虹 等译

庄万友 周柏青

涂厚善 校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03840

A. L. Bash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

Edit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New Delhi
根据(印度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第 2 版译出

03840

YINDU WENHUA SHI

印度文化史

A. L. 巴沙姆 主编

闵光沛 陶笑虹 等译

庄万友 周柏青

涂厚善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11-4/K · 397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693 千

印数 2000 册

印张 28 3/4 插页 1

定价: 40.30 元



湿婆·达克辛那穆尔蒂（作为导师的湿婆）。在泰米尔纳
杜，希丹巴拉姆，东戈普拉南面，约公元1200年，高约2米。

译者的话

印度文化是世界上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与中国、伊斯兰、西方等文化并列。它的古老渊源与长期持续发展在世界文化中只有中国文化能和它媲美。它对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文化、对与我国邻近的东南亚各国文化也有很深的影响。因此，研究它的历史发展十分必要，对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我国人民尤其如此。这部《印度文化史》是从 4000 多年前的印度河文明开始到 1947 年印度独立初期关于印度文化发展的一部通史。它正是适合我们需要的一部学术著作。

这本书是由澳大利亚籍国际知名学者、伦敦大学文学博士 A·L·巴沙姆教授主编的。巴沙姆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授《亚洲文明》的教授，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所指导博士生工作达 30 多年，门生多人在世界各地从事印度史的研究和教学。他本人专精古代印度的宗教与文学。其重要著作有《印度奇迹》，这是一部享有盛誉的学术著作，有多种文字的译本。他还写有《印度历史与文化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的各个方面》等。他写的论文评论涉及面极广，包括印度的历史、考古、宗教、文学、艺术、科学等约有六、七十篇，他还主编《亚洲季风区诸文明》等。学者们认为他是对古代印度遗产进行重新估价的 3 位重要专家之一，另 2 位为 D·D·高善必和罗米拉·塔帕尔，后者曾受教于他。他在本书中除负责编辑外还撰写了“序论”、“结论”和“中世纪印度教印度”3 章。

参加本书撰稿的除巴沙姆外还有 27 位学者。他们大多从事所写篇章有关专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的并写有专著。以下简

略加以介绍：如执笔“印度河文明”一章的 B·B·勒尔为古代印度文化与考古学教授，又曾任印度考古总监，亲自主持印度河文明遗址卡利班根的发掘工作，著有《独立后的印度考古学》；执笔“阿育王的印度与笈多时代”的 R·塔帕尔为研究古代印度史的专家，著有《印度史》第 1 卷与《阿育王和孔雀王朝的衰落》等专著；执笔“哲学”章的达斯·古普塔曾写过《印度哲学史》5 卷本；执笔“莫卧儿人与英国人”的 P·斯皮尔就曾写过同名的专著，还写有《牛津印度近代史》、《莫卧儿人的曙光》等；又如“印度教”由曾任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副校长、讲授东方宗教的知名学者 S·拉达克里希南执笔，他还是《印度哲学》、《东方宗教与西方思想》等的作者；“印度与欧洲的早期接触”和“印度与近代西方”两章则由写过同名专著的前德干学院院长 H·G·罗林森执笔；“古代和近代的语言”由牛津大学梵语讲座 T·伯罗教授执笔，他还写有《梵语》专著，与此有关的“早期雅利安人”也由他执笔；“古典文学”由著有《印度诗文》3 卷的梵文与印度研究教授 A·K·沃德执笔；“锡克教”由著有《古鲁纳那克与锡克教》的 H·麦克劳德执笔；“音乐”由著有《北印度音乐的拉格》的 N·贾伊拉兹波易执笔；“穆斯林统治王朝”、“印度中世纪的伊斯兰教”与“印度与中世纪伊斯兰教世界”3 章由讲授南亚文明的高级讲师 S·A·A·里兹维执笔，他著有《阿克巴在位时期的宗教与思想史》、《16、17 世纪北印度穆斯林的信仰复兴运动》等；“伊斯兰教的改革运动”由讲授伊斯兰教研究的教授 A·艾哈迈德执笔，他著有《印度与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的现代主义》；还有如写有《达罗毗荼文学》专论的 J·P·马尔执笔“早期达罗毗荼人”；写有《德国对印度文化的反应》专论的印度学西藏学教授弗·威廉执笔“印度与近代西方”的后半部；著有《邦迪绘画》的 P·金德拉执笔“中世纪印度的袖珍画”，他是南亚语言与文明系和艺术系教授；著有《印度绘画》的达勒姆大学东方艺术博物馆馆长 P·S·罗森执笔

“早期的艺术和建筑”；著有《埃及与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建筑》的建筑学院讲师 M·S·布里格斯执笔“印度的穆斯林建筑”；写有《中国艺术中的“莲花经”》的 J·L·戴维森执笔“印度对中国的影响”。最后，“耆那教”则由耆那学教授 A·N·邬波陀耶执笔；“佛教”由僧伽罗克悉多比丘执笔；“中世纪印度文学”与“近代文学”2章由曾任印度文学学会秘书的克·克利帕拉尼执笔；“社会政治思想和制度”由伦敦大学东方法律学教授 J·邓肯·M·德列特执笔；“中世纪印度教虔诚派”与“英属印度的印度教宗教和社会改革”二章由讲授南亚文明的高级讲师 J·T·F·乔登斯执笔；“科学”由伦敦大学哲学与科学博士 H·J·J·温特执笔；还有南亚史高级讲师 J·B·哈里森执笔“葡萄牙人”；曾任历史教授的 A·拉姆执笔“印度对古代东南亚的影响”；历史讲师 H·欧文执笔“民族主义运动”。

由此可见，本书的编辑和撰稿人都有比较深厚的专业基础，一般都有丰富的研究工作经验，有的并取得过重大的学术成果，因而各章都有较高的学术质量，最后又经过巴沙姆的精心编排，全书就成为一部很有特色的学术专著。

这部书的特点有以下几点：（1）本书分4部分，头3部分是从印度历史的发展说明印度文化的发展及其在各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以至形成印度人民宝贵的历史遗产；第4部分又从与外国交往的历史进程中说明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影响以及印度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这两方面都有确凿的史实表明印度的文化不是停滞不变而是逐渐积累、演变和发展，印度不是与世隔绝、孤立的而是直接或间接与外界交往的。这便有力地驳斥了西方殖民主义者歪曲印度文化的一些谬论。

（2）由于文化的兴衰与统治者的扶植或压制、时局的平静或战乱、经济的繁荣或匮乏、国际交往的开放或闭塞密切相关，因此，本书十分强调印度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的论述。因而在正文前编

制了简明的年表,分栏标出同时期印度北南两方,最后发展到全印的政治经济大事,文化与宗教的大事和国外大事,帮助读者掌握印度文化发展时的国内国际历史形势与各时期的主要文化成就。在序论中编者又简要介绍了印度历史发展与文化演变的基本线索。正文中还设置专章(如5、6、17、28等章)比较具体地说明当时政治经济的变化,特别是对文化有影响的方面。其他各章中也注意到这种背景的介绍,用历史的线索使全书各章连结成一个整体。

(3) 本书很重视印度文化产生的自然条件,即次大陆的土地和气候。序论中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它的特点及其对人类生存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些自然条件和入居印度的各族人民是编者认为的印度高度发展的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并将继续制约着印度人民未来的生活。特别是对创造印度文化的重要种族,如雅利安人、达罗毗荼人等,本书有专章论述。在这些章里,与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的语言文字占有首要的地位,编者运用比较语言学探讨各族的起源、迁徙与扩展、原有文化及与外族关系等,对随后迁居或入侵印度的阿拉伯人、突厥人、葡萄牙人、英国人等,本书也有相当的篇幅的论述,因为他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文化,丰富了印度的文化,对印度文化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又编者重视各族的语言文字问题,还因为这种文字的史料多半是第一手的资料,对论证问题更有说服力。

(4) 分期问题是研究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本书把印度文化史的发展分为3部分:①古代的遗产;②穆斯林统治的时代;③挑战与反应——西方人的到来。对某一方面的文化也有其本身阶段的划分,如语言中印度雅利安语有古代、中古、近古之分,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还可以分为3期;文学有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与现代文学;建筑艺术也有早期建筑、穆斯林建筑(中世纪绘画)与现代建筑艺术;又如佛教、哲学、民族主义运动等也都有分期。有的如文学,

各期均有专章;有的如建筑艺术则用两章,现代部分则在结论章中提到;有的如佛教等在1章中论述。作者概括了各时期的特点与成就,从而也说明了其间的变化。

除了这种前后对比的论述以外,各方面的比较研究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之一。不同时期如孔雀王朝与笈多王朝的对比,不同地区如荷马时代与吠陀时代的对比,印度封建制与西欧的比较,印度宗教改革与西方宗教改革的比较,不同教派如耆那教与佛教的比较,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等都有一定的比较对照。有比较就可以有鉴别,可以更深刻具体的了解其特点。另一方面,从比较中看到的差异可以启发人们思考,探索差异产生的原因。如研究1526年莫卧儿人到来时的印度和1761年莫卧儿人崩溃时印度的差异,就可以看到莫卧儿人对印度的作用。这样的探讨是很有意义的。

(5) 本书善于发掘史料与运用史料,并重视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如从《政事论》、从迦梨陀娑的剧本中搜集当时有关使用齿轮机械的科学知识资料;如运用古代印度的谚语、格言来探讨古代印度的政治理想等。新的资料与研究成果除在正文中运用外,有的更用附录形式特别标明。如科学一章的附录提到,芬兰语言学家们利用一种计算机方法释读印度河的文字似乎可以表明天文学的28宿之说源出于哈拉巴,这就大大提前了28宿之说开始的时间;又如东南亚的考古学是当前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因而编者就特请在这方面有研究的H·H·E·卢夫斯博士给本书第31章原文后增加了附录。它提到由于该地区考古的新发现,印度文化对这一地区影响的一些旧的看法就得要改变了。编者在本书结论中还声称,由于对过去的知识迅速增多,看法也日新月异变得更快,因此,书写的內容要随时准备用新的成果来更替。这种求新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6) 印度文化的历史是悠久的,内容又丰富多彩,本书的篇幅不大却能有比较全面的介绍,这是由于本书能够简明扼要说明问题,对一些复杂深奥的问题也能做到深入浅出。虽是学术著作,却不带学究气,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又配合正文选用了一些地图和图片。因此,这本书对我们了解印度文化,研究印度文化,很有参考价值。

当然,本书也有其不足之处。主要的是本书忽视了印度物质文化方面的成就,如棉的种植、棉纺织业的发明、制糖术等,有的完全没有提到,有的虽有涉及却未给以应有的地位,对唯物主义的哲学也未给与应有的评价,如对顺世论,只作为一般的异端教派,加以简略介绍。对这种学派受攻击、著作被毁的情况也完全不提。其次本书还忽视了东方文化对印度的影响。特别是古代中国的文化,如对文化发展起巨大作用的造纸术和印刷术都是中国发明的,从中国直接、间接传入印度。本书中虽提到这些发明是国外传入,但未提到中国。又如老子著作曾译为梵文传入印度,对印度宗教哲学有一定影响,本书也未提到。本书有关的章节名称提的是《印度对古代东南亚的影响》、《印度对中国的影响》,这便限定了印度文化只是单方面对这些地区传播、施加影响。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本书在政治观点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结论一章中认为英国比较容易和迅速撤出印度是英国少数有识之士早已有此认识,而不提印度人民要求民族自决的长期斗争。对印巴冲突不提英帝国主义“分而治之”造成的恶果。对印中边界纠纷竟归结为中国的侵略,而不能认识到这是英帝国主义侵略的遗产所造成的。事实是印度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侵占了中国的领土,而不是相反。最后编者在本书前言注中已提到对印度文化的一项重要成就“舞蹈”,没有专章,这是一大缺陷。还有前后各章有些观点不一致,编者已加注说明,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译本是根据本书 1975 年版^① 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印度史研究室闵光沛、庄万友、陶笑虹、周柏青、涂厚善等分工译出初稿并相互进行初校（分工章节译者名列在“译者的话”之后^②），还有范铁城、游巧荣（外语系）、蒲亨强（音乐系）参加了部分章节的初译工作。对全书进行校订的为闵光沛，最后由涂厚善总校。

本书的译名原则基本上与我们翻译的《高级印度史》（商务 1986 年版）相同，这里不再赘述。书中所附印地文、梵文等字母上的符号，因排字困难均已去掉。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原书，切口一边附有原书页码。11 幅地图均按原书绘制并译成中文。

我们在校译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黄心川教授、北师大史学研究所刘家教授等的帮助，特此志谢。还有一些其他同志也曾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和关心，这里一并感谢。最后要特别提出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责任编辑陈廷祐先生，他尽管已经离休，仍坚持要把本书审编完稿。这使我们铭感不尽。

最后，由于我们对印度史研究不够，尤其是对印度文化史的一些专业理论和知识不甚熟悉，外文水平不高，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涂 厚 善

1992 年 4 月

① 其中“印度词语发音注意事项”与中文译本关系不大，“撰稿人名单”基本上已见“译者的话”，因此，这两部分删去未用。供“进一步阅读的书目”绝大部分均无中文译本，故原文未译，仍作为附录刊印。

② 译者及其分工的章节表列于下：

闵光沛译 12、13、15、30、31、33、34、35，共 8 章

庄万友译 2、14、21、23、24、25、29，共 7 章

陶笑虹译 3、4、10、11、26、27、28，共 7 章与“编者前言”

周柏青译 5、7、8、9、20、22，共 6 章与“年表、地图及图片说明”

范铁城译 1、17、18、19，共 4 章

涂厚善，32；蒲亨强，16；游巧荣，6。各 1 章

编者前言

√ G.T.加勒特主编的《印度的遗产》(原文以下简称“遗产”——译者),问世于1937年。该书的撰稿人包括当时一些最有才干的专家。在它的15章中,有几章至今仍如在写作之时一样正确。尽管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印度独立,以及这两个重大事件以来观念的改变,使得一些章节完全过时了。另一些章节,由于大战以来作出的许多发现和提出的新理论而变得陈旧。

显然有必要对该书重作编写。15年前,拉加万·埃耶尔博士率先拟订了一个计划,并与一些撰稿人进行了联系。1968年,克拉伦顿出版社请我在埃耶尔博士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承担起完成这一著作的责任。我接受下来,并授权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为本卷委托作者并重订计划。正如由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撰稿人构成的庞大合作项目几乎不可避免的情况,完成这一任务比我预期的费时更长,也更艰巨。但它终于完成了,谨将这个成果奉献给读者。成效如何不无疑虑,但作为撰稿人和编者为了说明印度如何得到往昔的遗产和世界如何得到印度的遗产所作的真诚努力,我希望读者将接受它。原来的《印度的遗产》尽管有许多长处,却存在若干空白。在填补这些空白并作出更全面评述的尝试中,日见清楚的是,原来的书名已经无法包容新出现的内容。它已不再是一种“遗产”。因此决定将本书定名为《印度文化史》,我希望这样做不致于过分不逊^①。

① 甚至就本书的现有内容而论,它也有空白。我原拟收入关于吉普赛人的一章,

本书的许多章节出自国际上已负盛名的老一辈学者的手笔，同时我也毫不迟疑地求助于比较年轻、不那么出名的专家，看来这一做法是可取的。本书书稿来自5大洲中的4个大洲（而一位撰稿人现在第5大洲——非洲工作）这一事实本身便确实证明了印度在今日世界的重要性。

加勒特主编的原来的《遗产》中，有4篇书稿保留了。尊敬的拉达克里希南教授论述印度教的一章，内容真实而写作出色，经过编者的一些增补，仍被留用。类似地，经过编者的一些更改，保留了已故的S·N·达斯·古普塔教授的一章，他对印度哲学的不可概述，仍为这一课题最有权威、最为全面的论文。已故的H·G·罗林森教授关于印度文化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令人满意的一章也保留了，但在本书中它被分为两章，并由一位对该课题有专门研究的德国学者补述了最新的研究成果。马丁·布里格斯关于印度的伊斯兰教建筑的文稿也保留下来了，其中被删除的几页，是对一度争论而现已有定论的问题所作的讨论。除了这几章之外，所有的题材都是新作的。

我不曾试图以主编的资格强求为数众多的协助撰稿者将其文稿写成一种特定的格式，只是在一开始向他们说明，我希望本书要强调现代印度得自往昔的遗产和她给予当今世界的众多遗赠。我的主要任务在于力图使本书在词的拼写、表音法和印刷的惯例上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在于间或添写一些简短的解释性评语，在于对少数显然过长的书稿进行删节。至于从加勒特的《遗产》中保留下来的那几章则另当别论。

我的原订计划包括“独立后的印度”和“独立后的巴基斯坦”等

他们也是印度历史的组成部分；还有颇存争议的横跨太平洋的交往问题也可能在考虑之列，这些交往中有一些肯定早于哥伦布时代，尽管交往不多，又是间接交往。更严重的是缺少关于印度舞蹈的一章，那是印度对世界文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

章节，这两章将概述这两个国家在最近 25 年中的主要趋向。但因考虑到本书的篇幅和其他章节已包括了当代情况的许多方面这一事实，我终于决定放弃这一计划。在安排这未写的两章之处，用一个简短的结论试图使这部书中纷繁的头绪归为一体。假如在这方面我可以自己作出一些评价，有的意见可能与某些撰稿人的论述相左，那么我是作为一个与南亚地区有过多年密切接触，对那个地区的人民及其文化怀有深厚感情的人，满怀敬意地提出我的看法的。

一些读者可能对加在字母上，甚至在人们熟悉的印度名字字母上为数甚多的发音符号感到不快。（译者按：为了排字上的便利，这种发音符号在中译本中没有排印出来。）对这种情况引起的烦恼，我负全部责任。鼓励说英语的公众在印度名字和术语的发音上要至少大致准确，是我毕生较次要的任务之一。读者将注意到紧接在这篇序言之后关于读音的意见。（译者按：这个意见是编者针对英语读者而作，中译本未译出。）

在目前情况下，像这样一部著作的主编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在于本书的书名。原先的《遗产》出版时，除了其外交事务受印度控制的尼泊尔和像印度一样是大英帝国一部分的锡兰（现在正式称为斯里兰卡），整个南亚地区清楚无误地指的就是印度。而今天，这一地区包括 5 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其中，印度共和国无疑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当“印度”一词在某种情况下用于超出印度现今疆界的地区时，有时这一事实导致表示抗议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我记得一名加德满都籍学生就愤愤不平地宣称，他的国家未得到应有的光荣，因为乔答摩·佛陀一无例外地被认为是印度人，而事实上他是尼泊尔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地方性紧张状态引起类似的抗议，其理由举不胜举。我承认民族感情的力量，我也无意冒犯南亚其他国家的公民，可是这里的“印度”，

有时候不可避免地必须从其最广义的历史意义上来加以理解。

无论如何必须记住，“印度”一词本身并不是出自印度，而是出自希腊。在穆斯林来到南亚之前，那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居民连想都没有想过用这样一个名称来称呼自己的国度。印度河在梵文中为“信度”(Sindhu)。印度河地区(现在它的大部分为巴基斯坦)成为伊朗阿黑门尼德帝国的一个州，称为“欣都什”(Hindush)，按这两种语言之间固定的变音，印度的 s 变成了波斯语的 h。希腊人从伊朗人那里借用了这个词，称这条河为“印度河”(Indos)，称这条河流经的国度为印度(India)。看来，对希罗多德来说，印度河盆地就是整个印度。

至少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时代起，很可能还在他之前，希腊人就知道在印度河流域的那一边还存在另一条更大的河流，他们称那条河为恒河，出自梵语名称“殒伽”(Ganga)。顺便说一下，这后一个名字，现在不仅在印度语言中，而且在英语中，都被正式用于印度。鉴于它是该河两岸居民在约 3000 年间已知的这条圣河的名字，看来就无必要保留这一印度词汇的传统的变形。所以，我们这部书经常采用殒伽这一名称。

后来的古典时期作家，尽管其地理知识很不准确，却经常用印度这一术语指自喜马拉雅山延伸至海的这一大片土地。阿拉伯语“信德”(Hind)和波斯语“欣都斯坦”(Hindustan)在较后的一个时期中具有同一涵义。于是 2000 余年来，欧洲和西亚不顾政治边界地将“印度”一词用于整个南亚大陆。在这样的情况下，像“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这种累赘的说法就很不可能有了。我们只得保存“印度”之称，即令我们超出了今天印度共和国的版图。

最后是要对我在工作过程中得到的大量帮助和指导致以谢忱。首先，我必须感谢拉加万·埃耶尔博士，他在卸下其主编责任之前收集了若干章的初稿。我十分感激邓肯·德列特教授，是他

最早建议我承接这一任务,并作为我在伦敦的联系人,还为本书撰写了出色的一章。我要对全体撰稿人的慷慨合作和(在许多场合下的)耐心表示感谢,对其中的几位我要特别致谢,他们在最后一刻给我以帮助,一接到通知便马上写出了所需章节。许多同事在物色撰稿人选和其他重要事项上,给我以极为有益的建议——在这方面,我尤其想到 W.G.阿切尔先生, J.M.德·琼教授, H.H.E.卢夫斯博士和 S.A.A.里兹维博士。为成功地完成这一复杂的编辑工作,我得到亚洲文明系秘书乔斯琳·伯金夫人、系研究助理玛丽·哈钦森小姐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打字室的女士们极为称职的业务帮助。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的 J.C.哈尔博士在插图方面给予了无比宝贵的帮助。我还必须对克拉伦顿出版社工作人员堪称典范的耐心以及对我意见的信任表示感谢。

A.L.巴沙姆

堪培拉, 1972 年

viii 附言:

在本书付印期间,发生了若干重大的政治变动。东巴基斯坦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孟加拉国,发生在打印的定稿交出之前不久,本文中已作了注解。其后,为人熟悉的国名锡兰改为斯里兰卡,我不打算对本书的正文作相应的更改。再后来,印度的迈索尔邦变成卡纳塔克,几个小的山地土邦脱离了以前的阿萨姆。倘若我试图使南亚这些地区的每一最新情况都得到反映,势必会进一步延缓本书的问世。我恳请读者对这方面的不一致予以宽谅。

A.L.巴沙姆

1974 年

年 表

政治、经济				文化和宗教	外国大事	公元前
公元前		北 方	南 方			
2500年	史前史	石器时代—索安文化	石器时代—马德拉斯文化		约 2300 年 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萨尔贡时期	2500年
2000年	印度河流域	约2400—17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		约 2000—1500年, 印度—雅利安语发展为独特的语言	从其他印欧人中分离出来的雅利安人(印度—伊朗人)	2000年
1500年		约 1500 年, 雅利安人入侵印度H墓地的哈拉巴人			约 1750 年, 汉谟拉比米坦尼—胡里安国的雅利安人	1500年
1000年	吠陀	梵伽河流域的雅利安人—侨萨罗国、迦尸国、毗迪河国—摩诃婆罗多大战		约 1300—1000年, <梨俱吠陀>编成 约1000—800年, <梵书>编成	雅利安人(伊朗人)占领伊朗	1000年
900年	陀				975 年, 腓尼基人对印度商品的贸易	900年
800年	时	约 800—550 年, 第3阶段—雅利安人开拓殖民地抵孟加拉		<摩诃婆罗多>开始编纂		800年
700年	期			约700年, 白史婆阿鲁尼·乔达摩	7—6世纪, <伊利亚特>编成	700年
600年				约 700—500 年, 轮回说的发展	约 600 年, 毕达哥拉斯与俄尔甫斯教	600年
500年			5 世纪, 南方的雅利安人开拓殖民地于锡兰锡兰的水利	约563/6—483/6年, 乔答摩·佛陀约 500 年, 大雄奥义书编成	510年, 波斯的大流士派斯库拉克斯沿印度河而下	500年
400年	佛教时期	326年, 亚历山大在旁遮普 321年, 旃陀罗笈多建立孔雀王朝		三藏编成 约350年, 波你尼	希罗多德 428/7—348/7年, 柏拉图	400年
				原型的考提利亚<政事论>	323 年,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卒	